

“我与学报”笔谈

徐天逸(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民进四川省委名誉副主委、省政协文史委顾问)

到民进四川省委担任领导职务之前,我在四川师范大学工作了整整三十年。1973 年四川师大筹备出版学报的时候,我又是编委之一,因而对于四川师大,尤其是四川师大学报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学报创刊二十周年之际,自然有很多话要说。

社会主义大学是宏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场所,其明显任务是为国家输送人才,而深层次的要求则是组织高级知识分子钻研学术,力争有所突破,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在学术海洋中能擎大纛,敢为天下先,以显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四川师大近二十年来的发展与时代同步,最使人瞩目的是学术空气日趋浓厚,学术新芽不断成长,这是非常可喜的,也是来之不易的。

回忆自 60 年代起,关于普及与提高孰重?教学与科研谁先?应突出师范性抑或向综合大学看齐?大学应否成为科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军?等等问题的探讨与论争,发言盈庭,难求一致。在此漫长的过程中,四川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在校党委领导与支持下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编辑部主要负责人对学报的性质体会很深,支持百家争鸣,而又情有独钟,穷年累月,辛勤组稿,披沙拣金,探骊得珠。历年学报涌现出一批学术论著,皆刻意创新摆脱窠臼的精品,其上乘有可以传世者,士林认为学报导向之功不可没。

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后,全国出现万马奔腾的态势,各行各业常见英雄出于少年,这是我国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学报同仁过去与校内外大师、名家同甘共苦,已培植了学报这所“黛色参天二千尺”的园地。人们殷切希望,趁薪盛而传火,再培植出一个“万紫千红新绿满”的又一景观,以应老凤、雏凤交相报春之需。

傅昭中(四川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教授)

我从 1973 年奉命同朱文显同志一起创办学报,到 1992 年免去文科学报编辑部的职务,按年头算整整二十年。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从乌发的青年到鬓白的中年,此生最宝贵的精华时期都献给了学报编辑事业,其中的甘苦是永世难忘的。

学报从筹备到创刊后的一段时间,只有我和文显同志二人。当时校领导并未确定我们的职务和分工,我们彼此亦不计较。一切工作商量着干,从组稿、审稿、修改、校对,到联系印刷、寄发等等,全都共同搞。工作繁杂,却也较快熟悉了编辑出版的全套业务。在 1974 年第 1 期创刊号出版后,看见那凝聚着自己辛劳的一个个铅字,就像母亲第一次看见襁褓中的婴儿一样喜悦。

70 年代到 80 年代初,由于纸张紧缺,印刷困难,学报曾先后在几个厂印刷,较长时期是由成都印刷二厂承印。每期出版前的三次校对,我和文显同志都要骑自行车穿城 30 里跑厂几天。工

人师傅改一页，我们校对一页，最后还要把几十万字通读一遍，看得头晕眼花。午餐常在北巷子附近一家清真饭馆落座，两份米饭，共享一个菜和一碗牛肉汤，也就很满足了。工作虽辛苦，但听到中文系老师评论“校内出的印刷品，就学报的错字少见”，内心也有一种欣慰之感。

后来，编辑人员有所增加，有进有出，但始终是一个团结、温馨的集体。彼此间互敬互谅，相互间关怀鼓励，工作是舒畅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都有自己的个性：文显同志博学广识，严以律己；庆华、永政同志不烦杂务，兢兢业业；年轻的编辑才华横溢，思维敏捷，都使我从中学到感染，得到教益。在这里，我认识到兵不在多而在精，以及发挥个体优势形成整体合力对于推动工作的实际作用。

编辑工作的特点在智力服务，通俗说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从个人利益看，许多人是不愿选择这个岗位的。然而，我却认为这一职业给自己提供了许多难以寻觅的学习机会。学报应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方向，这就增强了自己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培养了学习理论研究现实问题的兴趣。学报是综合性学术刊物，发稿的学科面广，还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这就需要自己不仅懂得所学所教的专业，还要了解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基本知识和学术动态。学报编辑的主要职责是审稿，是作者文章的第一读者，这是难得的欣赏机会。读到一篇有见解的佳文，会拍案叫好，佩服、崇敬，因而结识了不少校内外有学问的朋友。读到有闪光思想但论证或结构欠妥的文章，会为之叹息；如果这是校内的作者，还常常帮助出主意、想办法，有时甚至亲自动笔作加工、删改、润色。刊发后的文章如果受到社会重视或作者以学报文章晋升了职称，作为编辑也暗自庆贺。还有，人说编辑人员是“理发匠”，“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字殊而义显”，这又是难得的学习和锻炼。这样诸多的苦乐，岂是其他职业所能替代的？

后来，服从组织上的安排，我辞别了学报编辑工作，但有时还作点业余编辑。每当我翻起散发着油墨香气的新一期学报时，总是感到我的心仍然是和编辑部的同志们连在一起的。编辑工作的甘苦，也还常常引起我的回味和留恋。如果允许自由选择，我还将再次回去当学报编辑。这也算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吧！

王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四川中华书画研究所所长）

清代著名四川学者唐甄有一段名言：“学贵得师，亦贵得友。师也者，犹行路之有导也；友也者，犹陟险之有助也。得师得友，可以为学矣。”这段名言一直教育着我在治学和做人的长河中，虚心向老师请教，尊敬师长，珍惜同学、同志、朋友的帮助、支持、鼓励。从1956年9月我考入四川师大历史系到现在，已快38年了。在这人生关键的近38年中，我无时无刻不感到师大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们所给予我的力量。四川师范大学学报所给予我的教育、支持、鼓励，更使我永远难忘。

在“文化大革命”中，学术界被“四人帮”搅得不成样子。例如，他们从其政治目的出发，任意篡改历史，歪曲事实，别有用心地把李自成打扮成“反孔英雄”。明末农民战争史研究，更被搞得很不像话。明明是张献忠大西军的历史贡献，他们硬拉来贴在李自成的功劳簿上，“张冠李戴”；在重庆作战的明明是张献忠大西军，他们硬说是李自成，笑话百出。1978年，“四人帮”虽已被打倒一年多了，但极左思潮影响很深，学术界同样面临拨乱反正的严重任务。四川师大学报为了认真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表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论文，为繁荣学术作出了重大贡献。以史学为例，1979年第二期发表了拙文《“李自成领导明末农民起义”商榷》，实事求是地指出：“明末农民大起义初期的主要领导人中没有李自成。荊阳大会上李自成的正确意见被采纳并

不等于李自成领导了这次大会。崇祯八年到崇祯十四年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张献忠而不是李自成。在南北两个战场的作战过程中,张献忠与李自成既是互相支援又是各自独立的。推翻明王朝是李自成和张献忠共同斗争的成果。”而1978年出版通行全国部编《中国历史》课本第二册第四章第四节却以“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战争”作为标题,对明末农民大起义进行了片面论述。1978年、1979年部颁《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也以“李自成领导的明末起义(或战争)”作为专目。拙文发表后,在史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新华月报》1979年第九期全文转载了拙稿。1980年部编《中国历史》课本第二册亦对第四章第四节标题及有关内容作了改正。

我国知识界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以荐进良士明白是非为己任”(韩愈语),发现人才,扶掖后进。四川师大学报编辑部的领导和同志们,以博大的胸怀,敏锐的慧眼,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有志于学术研究的人才。昔日曾是四川师大学报投稿者的中青年,在学报热情的支持、鼓励和培养下,如今已成了我国有关学术领域的著名专家、教授。回想1980年我前往北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的副研究员答辩的前夕,师大学报编辑部的朱文显教授、傅昭中副教授为我精心修改论文稿的情景,真使人感动万分。那是1980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朱、傅二位老师在百忙中专门安排了一个半天与我一起在学报编辑部讨论修改我的论文稿。根据他们的指教,我通宵改稿誊稿。第二天上午,又对我的修改稿进行评论。为了进一步提高论文质量,他们还要求我回到重庆后再作修改补充。当我1980年7月正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答辩前夕,正好又收到由师大学报编辑部寄来刊登拙文的学报时,顿使我热泪盈眶。正是我的母校四川师大学报给了我一次又一次无私的热忱的支持和鼓励,才使我顺利地完成了答辩任务,并从此踏上了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途程。

转眼20年过去了。四川师大学报为捍卫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繁荣学术研究,为发现和培养人才,作出了功德无量的贡献。作为师大学报的一名学生,我为我的母校有办得这样好的学报而感到自豪,我为学术界有这样好的理论刊物而感到鼓舞,我更为自己能成为四川师大学报的作者和忠实读者而感到骄傲。

在四川师大学报创刊二十周年的喜庆日子里,衷心祝愿她永远成为理论战线的阵地,学术研究的园地,作者读者的良师益友!

李宗桂(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今年是母校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创刊20周年。值此可喜可贺之际,远在南国的我,在向学报致以由衷祝贺和敬意的同时,回想当初学报对我的扶持,真是思绪万千,倍感温馨。

由于我从知青时代便对中国传统的文、史、哲有浓厚兴趣,希望能够从事三者兼顾的工作,因而我从1978年跨入四川师大政教系之日起,便决意要报考中国哲学专业的研究生。但是,平心而论,我当时还没有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的志向。可以说,我当初要报考中国哲学专业方向的研究生,主要是兴趣爱好所在,而非学术追求使然。当时的我,认为学术研究是神圣的,学术殿堂非我辈所能涉足。真正使我在观念上发生根本转变的,是大学二年级时我在母校学报上发表了学术论文。当年,我将平时阅读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后的心得撰写成《试论王安石的哲学思想》一文,投给学报。由于当时心情十分惶恐,连编辑部的大门都不敢迈,惴惴不安地将稿子投入学报的信箱。原以为会“泥牛入海无消息”,殊不知,不久学报就通知我去谈话。朱文显、傅昭中两位老师和蔼可亲,坦率地提了一些问题,傅老师还提了具体的修改建议。我按照他们的要求修改抄正后,学报很快发表了拙文。我和朱、傅二老师素不相识,而我仅仅是一个普通学生,他们如此认真对待学生的

投稿,热心扶持青年,使我深为感动,并大大增强了我进一步学习的信心。不久,拙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复印,朱、傅二老师和我共享了喜悦之情。此文的发表,不仅有助于后来我报考中山大学研究生,更为重要的是,它转变了我的思想,增强了我的信心,促成了我在学海中游泳的决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篇文章在学报的发表,促成了我对学术研究观念的转变,是我人生路上的一大转折。此后,无论在我攻读研究生期间,还是在重点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学报对我的扶持是一如既往,我们之间联系密切,关系融洽,温暖之至!

从在学报发表学术论文的处女作以后,我一直在学术研究的园地辛苦劳作。由于我这辈人属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类型,而我又天资愚钝,加上努力不够,因而收效甚微。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我能够从一个普通的师范生,逐步成长为全国重点大学的教授,成为政府特殊津贴的享受者,成为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规划评审委员,并身兼多个全国性和全省性学术团体的常务理事之类的职务,主编两套全国性学术丛书,出版、发表了一系列个人论著,主持多项国家和国家教委的社会科学研究课题,都是和当初学报对我的扶持、提携分不开的。没有当初的“第一步”,便没有后来的这一切!学报,我感谢你!

汤炳正(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教授)

我跟学报的关系,谈起来话长。记得是1977年的一天,学报主编朱文显和傅昭中二同志亲到塔子山住地来见我(那时我在城内娃儿家里养病),并谈到组稿的意图。本来组稿工作,在编辑来讲,是常事。但当时“文革”刚刚结束,文化界刚刚解冻,人人心中有余悸。因而这时的组稿工作,无异是为学报的发展开山劈路,不同寻常。此后我才在学报上开始发表文章。一次,朱文显同志转来一张字条,告诉我:你某篇文章的内容,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动态》上作了数百字的扼要报导。言下流露出高兴的心情。作为编辑,跟作者如此痛痒相关,这不仅是对作者的关怀与鼓舞,而是表现了对学术事业的热爱与忠诚。有一次,我校对清样时,把排成“游”字的,皆按老规矩改成“遊”字。朱文显同志又转来字条说:标准简化字“遊”已简化为“游”,排印体已无“遊”字。作为编者,对作者的联系做到如此周到细致,确实不易。当然,编辑工作本有宏观、微观之别,但二者能兼备于一身而且结合得如此完美,这应当说是一个典范。

记得好象是1981年,我指导周芳芸同志写了一篇重新评价胡适的文章。在当时,文章的观点还不易为一般人所接受,而学报却毅然予以发表。结果颇为学术界所肯定。又1984年我们四川师大举行了全国性的屈原问题学术讨论会,学报主动配合会议选刊了部分论文。数年后,新疆大学的周东晖同志还对我说:自从贵校学报发表拙作之后,不仅促使我的屈原研究有了进步,而且大大坚定了我的专业方向。我觉得,作为一个刊物,能否在它的培育下成长起一批新秀,这应当是衡量刊物办得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志。学报对此应当总结一点经验。

学报要能办出水平,办出自己的个性,首先要力祛一般化的倾向,要求在理论上有了新的突破,在史实上有新的发现。但我还要再一次地强调:求“新”本身并不是目的,求“新”的目的在于求真。所谓“真”,即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接近事物的客观规律,如此而已。但这这就要求编者既善于识别,又勇于揭载。这是个学识问题,也是个担当问题。对此,愿作者与编者共勉之。

皮朝纲(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拙著《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概要》列入了《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1993年6月版),这勾起了我对十年前往事的许多回忆。在我学习和研究中国古典美学的过程中,是四川师大学报支持我学步,支持我走上写作道路的。那是1978年夏天,在全国科学大会关于领导干部应该“又红又专”,“不能长期安于当外行,要钻进去,逐渐成为内行”的号召鼓舞下,我提笔写了一篇有关中国古典美学的文章。对于这样一篇不足五千字且很不成熟的短文,学报编辑部却热情鼓励,予以刊载。这是对我多年来坚持业余学习的肯定和支持,并且对我后来坚持进行中国古典美学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也是我在学习和研究美学道路上的一个新起点。1980年起全国出现了学习和研究美学的热潮,在学报编辑部的诚挚关心和帮助下,学报先后发表了我研究庄子、葛洪、严羽等人的美学思想的文章,它们在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转载后,被选入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美学史研究》一书;庄子美学思想的文章又于1984年获四川省政府颁发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84年春天,我萌生了把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进行系统研究的打算,得到了学报的大力支持和具体帮助,于1985年以学报丛刊的形式出版了我的古典美学论文集,为我撰写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一书打下了基础。为适应教学的需要,我加快了研究和写作的步伐,于1986年出版了《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概要》。

应当说,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学报是我的朋友,是我的老师。我1954年毕业留校后,长期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能在种种压力下把业余学习和写作坚持下来,这除了党组织的教育,领导的关心,老师和朋友的帮助外,学报的支持是特别宝贵的,为我在1990年转入专职教师队伍,专门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准备了比较充分的条件。每当我回忆起这些情景,都会想起学报在我困难时候给予我的种种帮助,都会由衷的产生一种感激之情。

郭祝崧(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学报创刊伊始,我就获得她的支持,得以在学术研究上质疑成说,提出个人见解。

“文革”期间,我两次参加学生教学实习工作,同学和实习校指导教师曾对《竞选州长》的“教参”感到难解,因为它既肯定其主题思想,又批评其未提出以“革命手段”摧毁选举的主张。为此,我撰写了《〈竞选州长〉答问》。同时,又就课本及“教参”对《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课文的注解错误,撰成一稿供同学参考。在当时的环境下,一般刊物是不可能发表的,学报却刊载了,从而使我受到鼓舞。

1978年初,西北、西南、中南三大区二十六院校近百位教师决定协作编写《外国文学55讲》,选题会上指定我撰《沙恭达罗》一讲。8月在初稿审定会上,上古中古文学讨论组与会的大多数同志,坚决反对我提出的主题思想“爱情说”,主张仍用50年代以来的“阶级压迫与阶级斗争说”。虽然同组的周骏章(主编)、李孟雄(副主编)和应邀与会的华东许汝祉三位老教授都支持我的论析,但因我是讨论组召集人未便决断,致讨论达两天半仍无结果。因而大会决定调另两组的东方文学教师萧锡麟(副主编)、曾汾等教授、副教授参加讨论,云南省委有关领导同志也列席。再次讨论时,由于持“阶级斗争说”的同志无法从原诗剧找出内证,才作了“同意”的决定。为此,我撰写了《〈沙恭达罗〉的创作时期和主题》,也为学报采用。此稿发表后,即获得我省社科论文奖,其论断还得到80年代一些教材采用,今年还被收入一部东方文学教研论文集。

后来,我写的几篇论析东方文学作家和作品的稿件(有的用笔名“岳生”),涉及了“解放神学”的历史作用,现实主义创作思想与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的结合,文学论析必须反对“全盘西化”和“全盘苏化”等等敏感问题,也都得到了学报的采用。发表后,它们全被资料性刊物转载,有的还全

文被两种正式出版的教材采用和海外报刊转载、评摘,要非学报首载,这些情况都不可能发生。

当然,这并不是学报对我一人有所偏向,从二十年的学报上,我们可以看到她对拂陈见、创新解的文章是一贯支持的,特别是中青年同志(包括校外同志)的这类文章,刊载得极其众多。

我愿借此感谢学报对我的支持,更愿学报更多地支持中青年同志的教学科研工作。

韦茂荣(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我从1957年大学毕业到川师大工作以来,37个年头一直守在川师大。我喜欢川师大的天空,宁静、清新;我喜欢川师大的地境,起伏不平,多姿多彩;我喜欢川师大的学人,勤劳朴实,诚挚无华。但最使我留恋的却是川师大的图书馆和学报。图书馆的书,我读了大半辈子还未读够它藏书的零头,她是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营养仓库;学报则是我成长、发展和进步的阶梯,我是她的忠实的读者、作者和学生,她对我的影影之大、之深、之久,终身难忘。

改革开放后,我的第一篇文章是在全国的《心理学报》上发表的(1981年),后来《教育研究》(1991年)、《中国高校招生》(1993年)以及《四川心理科学》(1982年、1987年、1992年等)、《四川教育》(1985年)等刊物也用过我的文章。但刊发我的文章最多的还是学报,不仅数量多,而且也是我最用心、最能代表我的水平的文章。我获四川省政府颁发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的《智力理论三题》一文,就是在学报1990年第3期发表的。获省教委教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的《论高师公共课心理学的彻底改革》一文,也是在学报1992年第5期增刊上发表的。我申报职务晋升的代表作除所编的书以外,所选的代表性论文也是学报上发表的,并获得了省内外同行专家的好评。我在学报上发表的有些文章,不仅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全文复印发行,还被上海资料卡片社详细制卡发行全国,其影响已超出我省范围。从我的这些事实也可以说明,学报确实确实是我校师生对外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阵地,是扶持、培植和推广科研成果的最好的场所,是形成和保持良好学术风气和传统、不断提高科研和教学水平的有力工具,也是像我这样不很成熟的人发展、进步的阶梯。应该说学报对繁荣我校的学术研究,提高我校在省内外外的知名度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

我对学报编辑们在20年里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所显示的睿智和胆识,表示无限的钦佩!

我祝愿早已向国外发行的学报,在下一个世纪的国际学术论坛上,更显示她的风采!

邓元煊(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自1974年创刊至今,已是加冠之年,可喜可贺!20年来,其于社科领域多有创获,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科学的研究,培育了一大批研究人才,成绩斐然,功不可没。

我于1958年大学毕业,迄今三十六载,由中学而大学,从中文系到图书馆,工作几经变动,与学报却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74年第2期发表《〈华德焚书异同论〉浅析》开始,到1993年第4期发表《时人诗中见“真李白”》,先后在学报发表论文近20篇,差不多平均每年一篇,约占我公开发表的论文的三分之一。《关于宋玉评价中的一个问题》(1985年第1期)和《初唐“四杰”诗歌革新成功诸因素略论》(1989年第5期)两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还有几篇在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上交流,有的已收入有关的论文集。

这些论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在学术上的探索足迹和进展步伐。从中可以看出,为了适应工作变动的需要,我在各个阶段的科研有所侧重,但也始终保持着学术研究的连续性和一贯性。除

对鲁迅著作、中学语文教材教法、图书馆学等有所涉猎而外,科研重点是中国古代文学,近年来则更多致力于古籍整理。二十年来,或主编,或独撰,或与人合著,先后出版著作十余种,多是在我所发论文的基础上拓宽加深而成的。可以说,我的学术生涯与学报的成长基本同步,所取得的一点成绩与学报编辑部的帮助和鼓励,以及学报上其他论文的启迪是分不开的。学报是我难得的益友。

几十年来,我的科研工作大多是在业余进行的。焚膏继晷,兀兀穷年。虽勉力而为,仍深感不足。行将迈入老境,既不“知命”,又非“耳顺”,不禁感慨顿生。目睹学报正值英年,并以其勃勃英姿正准备去迎接新的机遇和挑战,又令人欣慰。机不可失,时不我待,自当借我忘年之交,快马着鞭,奋力向前!

王均裕(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值此庆祝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二十周年之际,作为一个忠实的读者和积极的撰稿者,我祝愿学报越办越好!愿这块园地不仅能继续培育出更多、更鲜艳的社科理论研究之花,而且能同步培育出更多、更优秀的科学技术研究的人才!这不仅对我们国家科学事业的发展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高校教师业务素质的提高和教师队伍的建设将继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利用笔谈这个机会,我想顺便说说:过去一部分人在解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往往把科学技术理解成技术科学,他们把“科学技术”限定在自然科学的范围以内,这是很片面的。其实,哲学、社会科学都是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所必须的,都是属于第一生产力范畴。基础科学、理论科学、社会科学的价值,是不能用一时、一地的市场价值去进行估量的。钱学森说过:“我们应当有这么一个认识,科学的基础研究(不光是自然科学,而是广义的科学),是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所必需的。”钱老的解释无疑是正确的。

我校学报的编辑先生们坚守这个属于第一生产力范畴的科学阵地,二十年来,他们默默无闻地耕耘着这块社科园地,为这块园地能“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精神财富,无私地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才智和精力。在此我要向全体编辑人员道一声:您们辛苦了!

我在学术研究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是与学报的鼓励与支持分不开的。我给学报的投稿不算多。我撰写的《模糊语言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形式和修辞作用》,在学报上刊登(1985年第3期)后,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复印。去年《略论语境的特征》学报发表(1993年第3期)后,旋即又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复印。论文的发表和由此引起的社会反响,不断增强了我科学研究的信心和勇气。

我爱我校的学报,愿这块社科理论研究的园地能培育出更加鲜艳的花朵!愿这块园地更加繁荣!

王洪楚(四川师范大学政法系副教授)

在庆祝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二十周年的时候,作为忠实的读者和作者,自有一番心里话要说。

首先,学报给教书人和读书人提供了一方用文之地,因而为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的提高,起到大力推动的作用,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方向明确、文风严谨的学报同仁默默耕耘的奉献精神 and 笔墨功劳,理应受到人们的尊敬。

其次,学报在编者、作者、读者之间的思想交流和文字沟通方面,形成了良师益友的相互关系。这里没有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表现,没有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行为,也容不得仗势欺人、自吹自擂、弄虚作假的歪风邪气。有的是敞开心扉,以诚相见,交换看法,细心推敲,共同提高。人间对良师益友的动人传说,学报也是受之无愧的。

其三,学报在论文选用方面,坚持质量第一的标准,坚持在质量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体现了真实的公平性和严格性。这种一以贯之的标准和原则,排斥了因人而异、因时而变、由主观随意性支配客观标准、凭感情和利益左右原则的种种弊端,从而保证了学报的质量品位,在社会上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二十年平,学报办得有声有色,成绩显著。除了学校领导关心、广大师生员工的支持和编辑部群体的辛勤劳动之外,以上几个方面,也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这也可以说是学报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优良作风。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当继续保持和发扬光大。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和深入发展,学校也面临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大发展的大好形势。学报也要紧跟形势,不断开创新局面。对此我希望在内容上适当增加国外社会科学动态方面的信息和重要成果的翻译介绍。这是满足教学科研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需要。而外语系和外事处的支持,也使增加这方面的内容具有可能性。

姚定一(四川师范大学政法系副教授)

我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过各种类型的文章,长长短短数十篇,但其中最能代表自己学术水平、自己花力气最大的是在我们学报上发表的11篇论文(计约10万多字)。这些文章在学术界反映较好,其中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9篇,目录全部收入《哲学年鉴》及《哲学动态》,有的列入《外国哲学史研究进展》,有的被省哲学学会评为优秀论文,有的在《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发表。我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果,除了自己的努力外,学报编辑的大力扶持是主要的原因。关于这一点还有一段缘起。

1980年10月我从外校调到四川师大,11月在图书馆读了我们学报的一些文章,滋生了想给学报投稿的念头。但又因我刚到学校,人生地不熟,更不认识学校的编辑,文章写好迟迟没有送去。但有一天因一个偶然原因,我斗胆把我的文章送到了学报,但并不抱发表的幻想,只不过想试一下罢了。可是过了不到十天,编辑就通知我到学报编辑部去一下。我去了,主编说:“你的文章我们准备采用,但还要作一些修改”,并详尽地提出修改意见。这篇文章编辑为我加工、修改,花了很大力量,终于发表出来。

初试的成功使我感触很大,主要有两点:第一,我校学报发文是以质论文,不讲私人关系;第二,编辑部发文侧重有见解,特别是有新见解的文章,对这种文章不惜花大力气反复修改,尽量让它发表。此后,我几乎每年要向学报投稿,并且是把自己认为最好的文章送去,总共发表了11篇。我个人觉得在学报上发表论文是推动我进行科研的强大力量,也是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手段。还有一点是在学报发表文章等待时间较短,新观点容易提前面世。例如大约在三年前我给某刊物投稿一篇,两个月后通知我准备刊用。但等了一年忽然接到一封信,信上说,“很对不起,你的文章中的主要新见解,××刊物上已登了一篇类似的文章,实在抱歉,请原谅。”等等,使我哭笑不得。由于我校学报对于有新观点的文章采用及时,常常得到学术界迅速反映。例如我的文章《理论的殒落——论尼采的〈权力意志〉》在学报一经发表,《哲学动态》、《人大复印资料》、《高校文科

学报文摘》立即迅速反映。我一位同事给我写信说：“我正准备写一篇评《权力意志》的文章，可是你的文章来得太快，论点大致相同，使我很难再写了。”

十余年来，学报差不多每年都发表我一篇论文，这不仅鼓励了我科研的毅力，在提职称上也起了决定作用。在此我深深感谢学报编辑的扶持。

邓小军(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参加笔谈“我与学报”，使我想起一件往事。那是1990年6月，在陕西师大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举行过后的当天晚上，我去拜访答辩委员会的委员们。谈话中，傅璇琮先生(北京中华书局总编)、郁贤皓先生(南京师大博士生导师)问我毕业后到哪里工作，我回答说到四川师大，傅先生、郁先生便都称道四川师大学报质量很高，往往有学术水平很高的文章。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我来四川师大中文系任教，转眼之间三年又半。这期间，我在学报及其增刊陆续发表三篇论文，从而与我们的学报结缘。

学报1991年第6期发表的《河汾之学与贞观之治的关系》，是我来四川师大后所发表的头批论文之一(同年发表我的论文的刊物还有《孔子研究》、《杜甫研究学刊》、《陕西师大学报》)。次年4月，我以此文及相关论文出席在山西万荣通化举行的王通、王绩、王勃研究会成立大会，并被聘为三王研究会顾问。同时，人大报刊资料《中国哲学史研究》著录了此文目录，《三王学刊》创刊号转载了此文全文。

学报1993年第1期发表的《柳宗元散文的艺术境界》，是我来川师大后发表的第三批论文之一(同年发表我的论文的刊物还有《孔子研究》、《杜甫研究学刊》、《江海学刊》、台北《鹅湖月刊》)。不久，《新华文摘》著录了此文目录，人大报刊资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复印了此文全文。同年8月，我以此文及相关论文出席在广西柳州举行的柳宗元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当选为全国柳宗元研究会理事。会议期间，《柳州日报》8月18日头版刊登了记者专访《寻找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访四川师范大学副教授邓小军》及照片。专访写道：“‘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柳宗元国际学术讨论会还未开，邓小军的6篇论文便先声夺人：《从性恶论到性善论的转变——柳宗元人性思想的发展》、《柳宗元散文的艺术境界》等。”

在我的学术成果问世的道路上，四川师大学报给了我有力的支持。因此，我对学报怀有一份感激之情。在学报发表论文，我意念中的读者首先是我们师大的同学们。因此，我对学报更怀有一份亲切的感情。

人文文化是师范教育之本。学报是高校学术水平与教学水平的标志。在我校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二十周年之际，我祝愿学报蒸蒸日上，祝愿师大日新又新，为四川和全国的学术发展与教育发展，不断作出更大贡献。

周芳芸(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十五年前的一个冬日，当我胆怯地向编辑部交上第一篇习作时，心中便与学报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最忠实的读者。在学报编辑指导下，我的《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之我见》一文终于问世，给浅薄幼稚的初学者增添了奋力前行的勇气和力量，生命中也留下了多少美好的记忆：忘不了为了《觉新形象的再探讨》的修改，朱老师、傅老师在编辑部与我促膝长谈：从选题意义，学术界研究动态，内容创新到论点提炼、逻辑结构、语言删简……谆谆教诲，受益匪浅。更忘不了《曹七巧论》

一文众编辑付出的汗水和心血。科研之路无坦途，跋涉者在重重险阻中时时皆可能陷入困境。我也曾为此迷茫痛苦，丧失自信，一度消沉。当我企盼以《曹七巧论》为突破口，冲出“围城”时，竟无勇气投交编辑部，只好私下悄悄请傅老师提提意见，投石问路。由于历史原因，张爱玲的著作曾列为禁书，此时刚影印出版。仅仅是为了给一位普通作者的论文“提意见”，身兼党委宣传部部长和学报副主编的傅老师在百忙中挤时间读了三十多万字的《传奇》，对论文从内容、结构到措词提出了中肯意见，令我好感动好感动。李大明老师细心审稿，为核实引文出处，读完了马克思的长篇论文，避免了因我的疏懒而可能引起的重大失误。此文在学术界引起一定反响，四川省现、当代文学研究学会评为优秀论文，谁能说成功和荣誉没有默默奉献、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的功劳？《曹七巧论》是我科研之路的突破口，感悟到切入人物心理的方法、途径，找到了以中国现代文学悲剧女性为研究方向，获得省教委青年科学基金。更重要的是编辑部老师关注着“下一篇是否还能写得这么好？”这对我是压力、动力、激励、鞭策——为了不辜负这期待，我深知山高路远，仍不敢有丝毫懒散懈怠。为学报增光是我心中深藏的秘密和心愿。近年来在我校学报发表的论文，有的获奖，有的收入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有的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或摘要，不知编辑老师可曾得到些许慰藉？

科研之路风光绮丽而又崎岖艰险。论文写作可谓是一种“甜美的苦役”。求索的困惑，超越自我的艰辛使我深感生命秋收季节的安慰和欢乐：在省内外发表20多篇论文，应邀参加中国社科院、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学术会……我深知这一切来之不易。固然，天道酬勤，然而，花草树木尚须雨露阳光，更何况人的事业生命呢？在川师大学报创刊二十周年之际，请接受一位普通作者最真挚的谢意和祝福：感谢所有为我的成长引航和铺路垫石的老师！祝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后学的园丁们生命之树常青！祝我们的学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田利军(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二十周年的喜庆之际，我不想说她在文科学报中所独具的魅力，也不想赞美她那令人敬佩的严谨求实的风格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因为这一切早已众所周知。我只想说说她为我们有志于社会科学研究年青人开辟的那一片芳土——“研究生论坛”。

记得7年前，那时我刚满22岁，还在读研究生。作为刚从本科毕业生就考入研究生的我，总在思考一个问题：研究生之为研究生总该和本科生有些不同，这个不同是什么呢？后来我想这个不同应该是研究生不仅要有求知欲更要具备创造欲。要有一定的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科学研究的能力。它的标志就是写出达到发表水平的科研论文。有创造欲望和创造力的研究生是很多的，他们的好文章也不少。然而研究生毕竟还是学生，所谓人微言轻。全国学术刊物虽然不少，但真正重视年青人学术成果的却不多。那时，包括我在内的不少研究生都感到苦闷和彷徨。辛勤的劳动一次次被否定，使有的人越来越怀疑自己是不是做学问的料，也使得一些原本勤奋治学的人自暴自弃：生命苦短，人生几何？既然“黑道”无望何不走“黄道”闯“红道”呢？这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独辟蹊径，“研究生论坛”让研究生们振奋不已。随着文学、历史、哲学、教育学诸领域一篇又一篇文章的刊出，一代又一代年青学者走上了教学和科研的岗位。考上研究生后举措不定的我也就是在自己的论文《试论南昌起义中的谭平山》在“研究生论坛”发表并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全文复印后，才下定了认认真真做一辈子学问的决心。

当然,发表的文章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文章。做学问的人希望自己的文章发表、著作出版也并不一定是为了名利,因为劳动成果被社会承认并获得与同行交流的机会总是令人快慰的。更重要的是这使研究者能更好地认识自己,增强自身在科研中的角色意识。认识人是困难的,正确评判人更难,而正确认识自己则是难上加难。难怪人们常常这样说:认识你自己!

纵观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值得称道的地方是很多的。但在我看来,她在培养年青学者方面独具慧眼,成绩最大。她让不少莘莘学子扬起了自信的风帆,使不少年青人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毅然选择了艰辛的治学之路。在当今高等学府不景气,投笔从商成风,教学科研人才严重断代的时候,学报此举确实极富战略眼光。她使不少徘徊迷茫的年青人看到了希望。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愿学报在今后的岁月中带给青年学者更多的鼓励 and 希望。

顾美玲(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系副教授)

四川师大学报创刊已整整二十个春秋了,真是可喜可贺。二十年来,学报为广大教师开辟了探索教育科学的理论园地,提供了发表真知灼见的机会。二十年来,学报以严谨治学,勇于探索,务实创新的精神风貌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在促进教育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在学报登出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影响战后美国成人教育发展的因素分析》,发表在学报1989年第2期,当年人民大学资料复印中心便在《教育学》第6期上复印了该论文全文,这对自己是个很大的鼓励。从此我与学报结下不解之缘,无论自己的教学、科研任务再忙,每年总首先考虑要为学报写一篇高质量的论文。随后在学报上发表的论文中,有一篇获奖,有一篇人大复印资料中心又载了目录。几年来,学报成了自己的良师益友。我想,对于许许多多的作者来说,也会有同感的。

在学报二十年的前进足迹中,我们看到了学报全体人员辛勤耕耘,不断奉献的历程。创刊二十周年,这又是学报的一个新的起点。祝愿学报去迎接更加辉煌的明天。

张玉堂(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系讲师)

我是1987年开始向学报投稿的,至今学报已先后采纳了我4篇稿件。向学报投稿的过程,就是我学习研究的过程;学报采用我的稿件的过程,就是我在科学研究道路上成长的过程。

我第一次向学报投稿时,编辑部的同志认真地审阅了我的稿件,提出了修改的意见。鉴于我的选题,建议我修改后投向另一刊物。我按照他们的意见修改后,投向了另一刊物,这个刊物采用了我的稿件。这是我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走出的第一步。这个可贵的第一步,是在学报编辑部的帮助下迈开的。

1991年下半年,我又向学报投第二篇稿件《德育结构与功能初探》。学报编辑部的同志审阅我的稿件后,对我的选题作了充分肯定,并建议我对文章的内容作一些充实补充,从结构上再进行一些调整。我按照学报的要求修改后,学报在1992年第1期上刊登了我的文章,受到了有关专家的好评。

• 我最初进行科研是在别人进行研究的课题中去进行再研究,利用对知识的再组合来出成果。事实证明,我走这道路是极其艰难的,甚至有可能导致我走向研究的死胡同。要想出科研成果,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开辟新的科研领域。我想,教育法规学研究在我国刚起步,还未引起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我们是师范院校,应当研究教育法规学。教育法规学同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

哲学等一样,是一门独立学科,有很多内容需要我们去研究,有许多领域要我们去开拓。我把这些想法同学报编辑部的同志谈了后,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和支持。所以,我以后陆续写了几篇这方面的论文,都被学报采用。

回想我在科研道路上成长的过程,每一进步都离不开学报的鼓励、支持和帮助。学报,可以说是我在科研道路上成长的导师。

学术动态

我校举行庆祝文科学报创刊20周年座谈会

庆祝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20周年座谈会,1994年3月24日上午在校荷花池学术厅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来宾有四川省新闻出版局顾问、我校老校长吉哲同志,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民进四川省委名誉副主委徐天逸同志,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文书研究员,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四川高校学报研究会理事长、四川大学学报主编田祖武编审,四川省新闻出版局报刊处侯渝梅同志,四川省社科联副主席、四川省干函院副院长吴世泰教授,四川省高校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西南政法学院学报主编徐静村教授,《毛泽东思想研究》主编姜忠副编审,四川中华书画研究所所长、省社科院王纲研究员,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曾枣庄教授,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乔毅民研究员,西南民族学院学报主编徐其超教授,《四川党史》主编刘建中副编审,四川省党史研究室副处长刘文耀副编审,四川电大沈庆生副教授,四川省教育学院学报戴为华副主编,四川音乐学院学报陈达波副主编,西南财经大学学报陈健生同志等。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杨焕章教授寄来了贺词。考虑到近来交通比较紧张,往来不便,所以除本市的学报同行和个别正在成都出差的外地同行外,其他省内外的同行和作者都没有邀请。

出席座谈会的我校党政领导同志有杨伯安书记、王均能校长、傅昭中副书记、杨泉明副校长。学校民主党派负责人,各部、处、室的领导同志,文科各系、所的领导同志,作者代表,研究生代表等,共80多人参加了庆祝会。

座谈会由文科学报主编朱文显教授主持。他代表学报编辑部向到会的全体同志表示感谢,并对学报20年来的工作进行了小结。副校长杨泉明教授代表学校讲了话,对学报20年来所取得的成绩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并对今后工作提出了希望。吉哲、田祖武、曾枣庄、王纲等同志发言,对学报创刊20周年表示祝贺。

座谈会上还由学校领导向学报1984—1993年10年间的优秀论文作者颁奖。在此之前,学校成立了以杨泉明为组长,由教务处、科研处和文科各系所负责人组成的评委会,评出优秀论文50篇。评委会副组长、科研处长李兆民副教授宣布了评选结果。获奖作者是:周永惠、张小元、唐淑君、曹万生、李星奎、王均裕、邓双琴、邓琴蓉、周芳芸、宋子然、姚定一、幸强国、吴军、王洪楚、文亚舟、程思进、田利军、侯德础、刘达永、杨天宏、赖华明、曾唯一、杨振之、潘后杰、顾美玲、骆天银、万顺福、郑宏华、刘益国、熊良智、沈时蓉、詹杭伦、吴明贤、赵晓兰、秦彦士、李诚、高林远、钟仕伦、李大明、张思武、肖明翰、龚登塘、沈世云、景黎明、杨亦军、曾枣庄、王纲、李宗桂、张惠仁、乔毅民。另外,还对二十年来积极为学报写稿、现已离退休的65岁以上的老专家冉友侨、屈守元、汤炳正、刘君惠、王文才、王仲镛、郭祝崧、苏恒、马功成、庾国琼诸先生授予荣誉奖。中文系周芳芸副教授代表获奖作者讲了话。

(大明)